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10 期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闻路831号23楼M室 Address : 831 Shanghai XinZha Road, Rm 23M
邮编：200041 ZipCode : 200041
电话：86-21-62188752 Tel :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〇年六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宣布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例如，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近 50 次，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年中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合作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年末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合作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至今均已经举办了三届。2009 年 11 月 21 日，又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国际研讨会，邀请了 200 名国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中国经济未来 30 年发展以及与改革成败相关的发展目标、路径和政策进行了研讨。这些研讨会针对经济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为各界人士的研究和决策提供了参考，获得了大家的好评。

我们希望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和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顾名思义，“研讨实录”将把这些活动的互动性质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编者的话

我们基金会所组织的研讨活动，粗略归纳一下，大致有以下几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每个月的发展沙龙，邀请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演讲；第二个系列是每年举办两到三次的研讨会，主题主要是中国宏观经济和世界经济，有时也会就一些突出的重大问题单独举办研讨会，如去年11月份组织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国际研讨会，以及正在筹备之中的今年秋天以城市化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还有一个系列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研讨会。

“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研讨会属于比较小型的，内部的专题讨论会。为什么要小范围内部讨论呢？并不是说研讨内容不可以公开，恰恰相反，其内容也是所大家关心的，关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之所以想限定一定范围，是希望讨论能更深入一些，更细致一些，而其内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我们也愿意并正在将这些内容与大家分享。

本期《研讨实录》刊登的便是最近召开的关于人口问题的研讨会的会议实录。虽然我本人主持并参加了整个会议，但现在阅读录音整理稿时，仍旧为研讨的专业程度、提问的针对性、以及讨论的尖锐程度而留下深刻印象。不知大家阅后是否有同感？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

“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研讨会之二
——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与农民工市民化

研讨实录

主办：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
上海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五楼六号会议室

目 录

顾宝昌教授做引导性发言：

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2

圆桌讨论.....23

参与讨论的嘉宾

- 顾宝昌..... 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 左学金.....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
- 彭希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 桂世勋.....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 刘焜松.....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研讨会之二 ——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与农民工市民化

乔依德：这次很高兴请到大家来参加会议。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是一个民间公益性组织，主要关注中国中长期的发展。我们从去年开始组织“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研讨会，是内部的小范围的学术活动。去年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是中国是不是要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

今天这一次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老朋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顾宝昌教授，请他作引导性发言。在座都是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对这个问题也很有研究。我不是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但是也觉得人口问题太重要了，讨论其他所有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布局都是离不开人口的。而外界一般又不太注意人口问题。我打一个比方，人口问题就相当于重力加速度，平时走在路上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一旦要上天，重力加速度这个问题就必定在那里存在。平时我们谈什么都不会讲到人口的，认为这是给定的条件，但实际上人口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次特地把人口问题特别地提出来，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因为不是人口问题专家，我在邀请信中只是粗略拟了三个问题，当然等会儿的讨论并不局限于这三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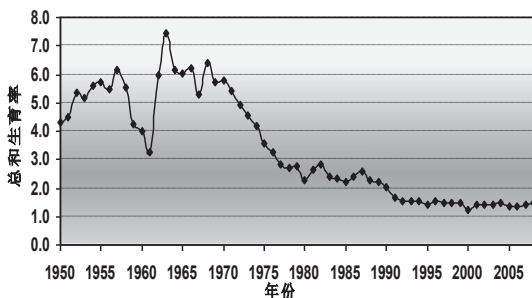
下面不多说了，就由请顾宝昌教授作引导性的发言。你们都是老朋友了，很多东西也都知道，为了讨论深入一点，顾教授讲的时候，如果觉得不明白，可以马上提问题。因为我们是小范围，并不是作报告，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讨论。这样可以讨论的深一点。

顾宝昌：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我尽量把我的发言缩短一点，等下大家可以多讨论。

先简单介绍一下人口变化的总的趋势。从 2000 年以来，我们国家总人口不断增多，但出生数不断减少，从过去的 1800 多万减少到现在 1600 多万，而死亡数在逐渐上升，所以这样造成了人口增长量不断减少，从 900 万到 700 万，再到 600 万。过去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年增长 1000 万，但从来没有出现过。

从建国到现在，出生率最高的时候，一年里面 1000 个人要生四十多个人，现在只有十几个人；从增长率来看，过去每年每一千人要增长三十多人，现在增长只有几个人。

当然，从我们人口学来讲，就像经济学用人均 GDP 一样，人口学讲总和生育率（TFR），从这些年来看基本保持在 1.4 左右的水平。现在大家对数据的准确性争论很厉害。但是我要强调，当然可以对数据的准确性继续研究，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总的走向。过去 50、60 年代平均每个家庭生 5、6 个孩子（忽视三年困难时期波动的话），到 90 年代初，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 2.1（更替水平）以下，再到现在，近 20 年时间处于一个低生育水平的状态。



图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1950-2008

左学金：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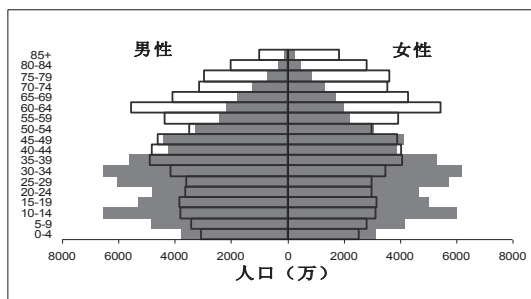
顾宝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自于它的年度抽样调查。

桂世勋：你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发表一下评论呢。

顾宝昌：我觉得基本反映了情况。我希望强调的是，要抓住人口大的走向，当然里面的瞒报漏报都可以来研究。任何统计数字都不是十全十美，包括经济数据。其实我觉得人口数据可能比其他数据还好一些。

总的来说，我们从过去高生育率的中国社会到现在已经是低生育率的社会，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从人口结构“金字塔”来讲（根据 2000 年普查的数据预测），男性，1965 年 -1970 年生的，经历了计划生育推进以后，出生量减少了，到了 80 年代提倡一个孩子以后，出生量又增加了，到了 80 年代中期又增加了，到了 90 年代又减少了，总的趋势很明显。这里有很多故事可以来讨论。总的人口走向可以看出来的。假如说再往后推 50 年，今天的 80 后就到这里。人口规律是死的，1 年长 1 岁，10 年长 10 岁，50 年以后长 50 岁，除非死掉，迁走。（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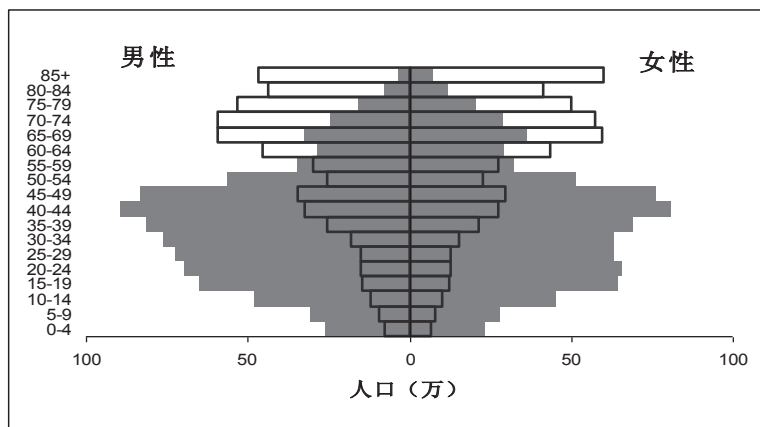


图二：中国人口的年龄和性别：
2000 年（阴影）和 2050 年比较

还可以看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上海，2000 年普查的数据，可以看到“腰”已经很高了，达到 40-44 岁（当然过了十年，现在就是 50-54 岁），从这以下就不断地削减。昨天的报道也登了，说上海保持了 17 年人口负增长（图三）。

左学金：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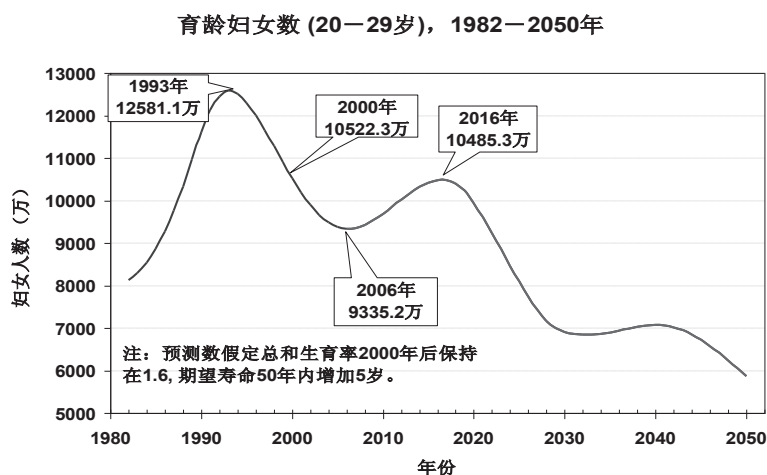
顾宝昌：户籍人口。实际上上海的人口结构注定了它是人口负增长。不仅过去是负增长，现在和将来也必将负增长。它的结构注定了它负增长的命运。除非外来人口迁移把这个补起来。假如说再往前走，到了 2050 年上海的情况就完全倒了。



图三：上海人口的年龄和性别：
2000 年（阴影）和 2050 年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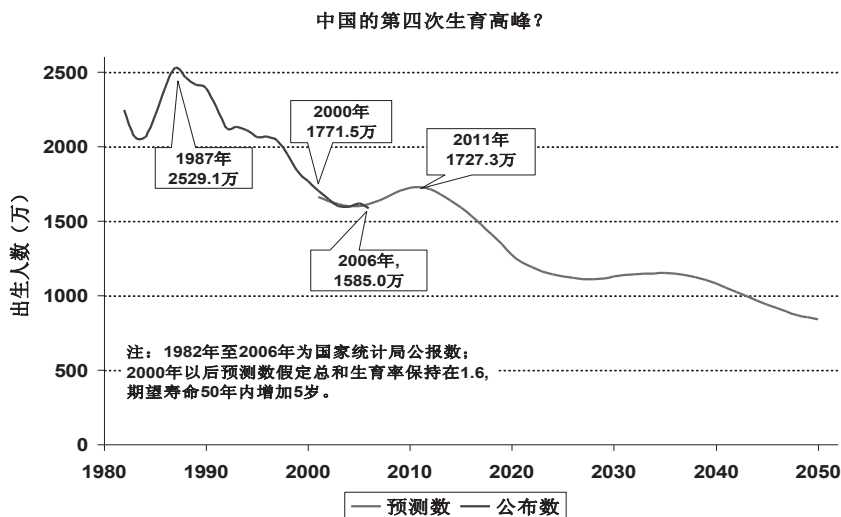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争论很厉害。现在马上要面临育龄妇女的高峰。现在 20-29 岁妇女是 9000 多万，到将来会有 1 亿多。但假如说把这个事情拉长看，就会看到这个 1 亿多还没有到 2000 年的规模，更远远低于 1993 年（在座很多人

还记得那个时候，当时两会期间召开中央座谈会，江总书记讲话的时候特别谈到人口高峰问题)。而且更需要强调的是，迎来小高峰之后，育龄妇女大大减少，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要下降一半以上。很简单的道理，现在生孩子少，10年以后小学生少，12年以后中学生少，18年以后大学生少，20年以后生孩子的人少（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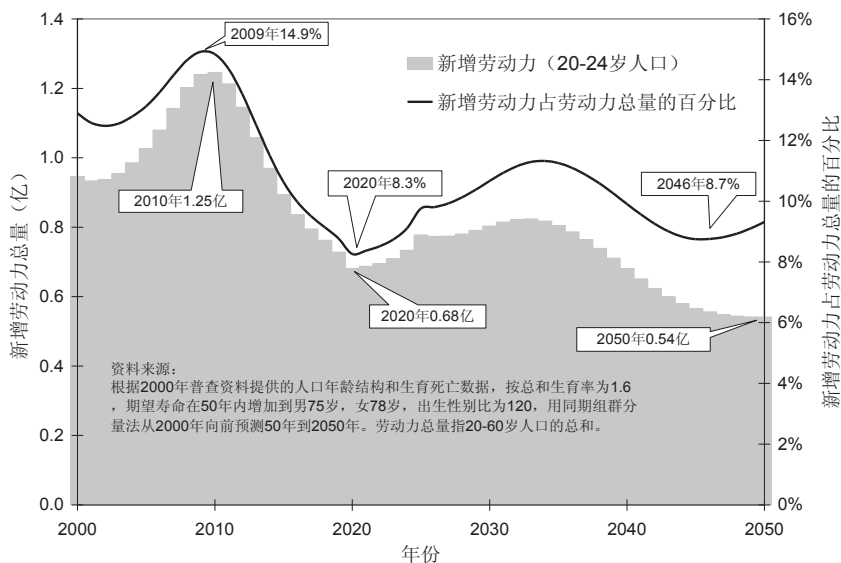


图四：育龄妇女人数（2006年以后为预测数）

还有认为，我们即将迎来新一轮出生高峰，出生人数会从2006年的接近1600万增到2011年超过1700万。但放在长期看，就会发现这个1700万还没有达到2000年水平，更远远低于1987年所谓开小口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假如说往前看，在所谓小高峰以后，我们的出生数量一路下滑，在以后几十年里面，将从1500万左右降到700-800万左右，也就是说在今后几十年当中出生数要减少一半，这个情况几乎没有人关注了。（图五）



图五：出生人数



图六：关于未来新增劳动力趋势

还有一个劳动力的问题。大家说劳动力很多，中国劳动力总量比美国人口还多。但是仔细一看，新增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了。跟前面一样，现在生了孩子少，以后新增劳动力必然减少。所以将来人口比例中新增的劳动力（20岁-24岁）的数量从1.1亿多到7000万、5000万，不断减少。年轻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也将大幅度减少，从现在占15%，到将来不到8%、9%。（图六）

左学金：这里还没有减掉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吧。

顾宝昌：我说是新增劳动力。

左学金：新增是什么概念？是新增的年轻劳动力的还是年轻的减掉退休的？我国1950年代是出生高峰，到2010年代是退休高峰，如果把退休的减掉，到2015年前后劳动力总量就是负增长，不是正增长。

顾宝昌：没有减掉退的。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即使劳动力减少了，还有6-7亿劳动力。我的意思是不管是6亿还是7亿也好，但是新增劳动力数量，那部分受到最新教育，最富有活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那部分劳动力将大量萎缩。

乔依德：你这里的高点是2009-2010年，从总的比例也好，新增劳动量也好。那为什么外面很多人比如蔡昉说在2015年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点？是计算方法上面不一样还是口径不一样？

顾宝昌：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这里只是从20-24岁的人数来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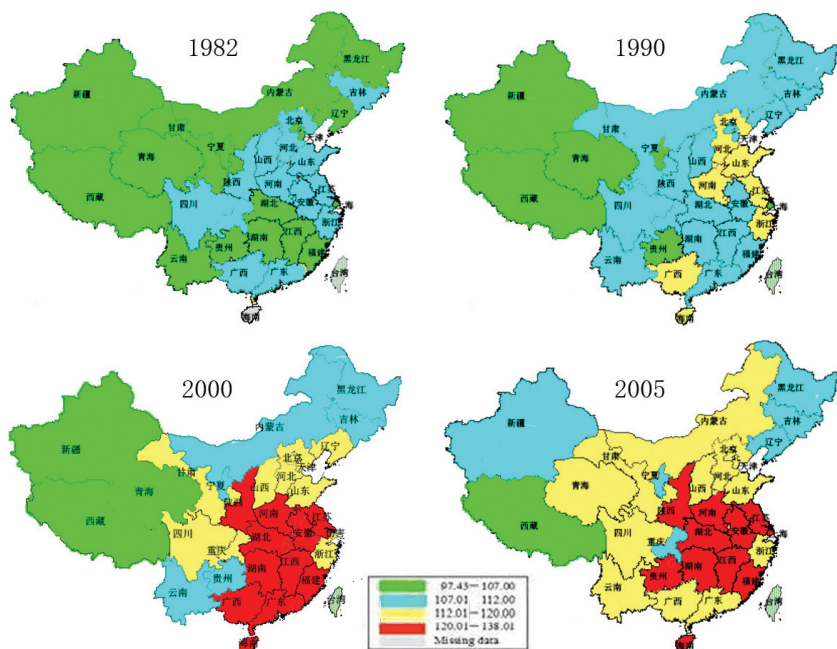
王桂新：蔡昉用的可能是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预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达到高峰（9.98亿）。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对蔡昉的观点有些误读，误解他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我看过他的文章好象他并没有这样说过。

顾宝昌：我这个是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来预测的数据。

左学金：2000 年普查数据可能低估了总和生育率。

顾宝昌：是的，但是因为争议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现在很保守，以 1.6 估算，不是以 1.4 估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性别比的问题（如图七），绿色表示基本在正常，蓝色表示稍微不同，红色的表示非常不正常。可以看到，从 1982 年到 1990 年再到 2005 年，越来越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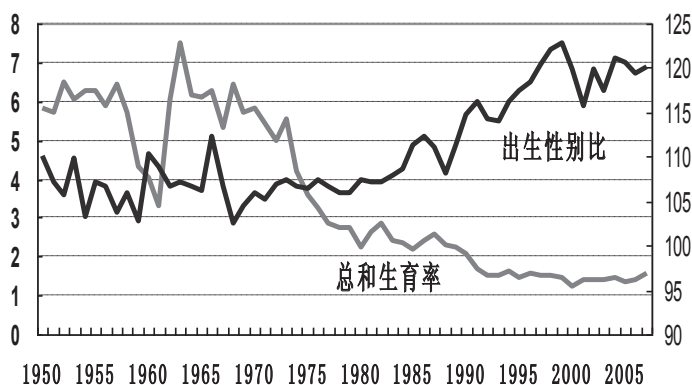


图七：中国分地区出生性别比：1982-2005

这里面有很多讨论。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重男轻女造成的，但是重男轻女在中国历来如此，不能说改革开放 30 年重男轻女思想更严重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由于农村缺乏收

入保障造成的，中国的农民从来没有社会保障，解放前没有，解放后也没有，现在在逐步改善，所以这也不能解释。还有的人认为是技术进步，现在可以做胎儿 B 超造成的，但是知道生男生女和做不做人流是两回事。

假如说把这两条线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我们国家 50 年代到 70 年代出生性别比基本处于正常范围，所谓不正常是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而出生性别比走出正常范围的时候也就是总和生育率压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时候（图八）。这里给我们一个感觉，假如生育下降的速度太快，降的水平太低，会激化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就是质量换数量，选择生了。



图八：中国总和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1950-2006

现在经济问题上，大家说过热过冷都不是好事，但在人口没有讨论，好像生育下降越快、人口减得越厉害越好。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应该把生育政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当时是以国家计生委和福特基金会的合作项目提出来，当时国家计生委说不宜以计生委的名义展开，应该以个人名义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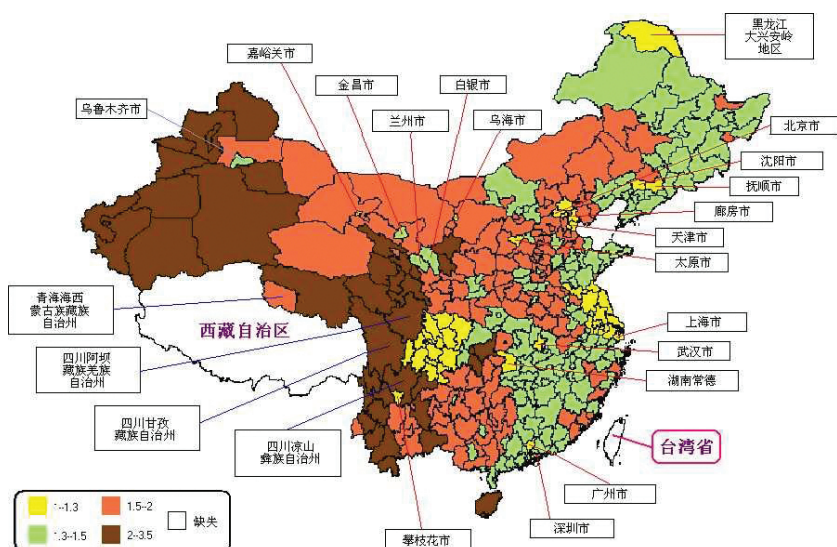
开。所以我们后来以个人名义展开了研究。

我们做这个事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生育水平已经长期低下，另一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使我们的行为多样化，同时权益个体化，人们的权益意识和自主意识越来越强，放开计划生育是还权于民。计划生育这些年也在不断改革，从准孕证的取消，等于把选择生第一个孩子时间的权利还给夫妇。然后生了以后，用什么避孕方法，过去叫“一上二扎”，现在可以选择符合自己的方式，也就是把使用什么样的避孕方法的权利还到你手里（上海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在全国存在这个问题）。还有过去即使政策允许生二胎，有时间间隔要求，假如说没有达到间隔要求，要流掉，或者作为计划外。现在越来越多地方取消了间隔时间，也就是说把按照政策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的权利也还到你手里。这个过程是不断还权于民的过程，把生育的权利要回归到群众、夫妇手里去。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要继续还下去。

我们第一次会议在上海的朱家角召开，在座的几位上海的同志也参加了，老彭做的筹划。完了以后马上向国家计生委的领导报告。计生委领导当时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历史使命，政策稳定是相对的，变动是必然，现在就要着手否则就晚了，等等，但是也说了要保持低调，不要炒作。

然后我们就先想回答到底我们的生育政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育水平？我们把全国各个地区的生育政策资料收集起来，计算出每个地区政策生育水平（如果 100% 按照当地生育政策生育，会达到什么样的生育水平？）。结果如图（图九），黄的表示 1.3 以下，绿的表示 1.3-1.5，咖啡色

表示 1.5-2，深的是 2 以上。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看到全国的政策不一样，基本上是从东往西，从低到高，和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但是总的来讲，全国在“1.5 政策”（即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下的人口占到一半以上。但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不可能生半个孩子，大概来说一半家庭生两个孩子，还有一半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加起来最终家里只能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占全国三分之二。全国人民 100% 按照当前的政策生，最后的生育水平是 1.47，平均每个家庭不到一个半孩子，即远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 2004 年正式草拟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由现行政策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会造成失控；调整采取渐

进式方案：“分布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现在有人说，有学者要求马上全面放开，到现在我没有听到谁是怎么说的，我们一直说要逐步地平稳过渡）。最后我们提出两个要求，一个希望中央把这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另外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应该要选少数地区先进行试点，在实践当中探索经验。但是这两件事并没有办成。

我们的建议出来以后，当时人口学会会长彭佩云同志很重视，她认为中国人口学会应该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为了低调，在保定（而不是北京），开了一个关于人口学术的内部会议，彭佩云会长、张维庆主任亲自参会，我们也报告了前面的研究成果。

报告了以后引起了一系列的质疑，反响并不正面。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个是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关系问题，觉得生育水平低是政策严，如果生育政策一放松，生育水平就要反弹，人口就要失控；第二个问题是说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没有关系，即使生育政策调整了出生性别比也会不正常，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是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时间最长的国家，这跟生育政策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关系，很多人说“我现在做计划生育工作，就靠生育政策，但是生育政策动了，我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没法做了”，但有人说“现在计划生育工作不好做，就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动，如果动了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不同的意见很多。

为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2005年-2007年又在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实行“二孩政策”的地区进行了调研，包括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广东。想

看看到底实行可以生育第二孩子的政策以后，对人口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 07 年 9 月份，大家形成报告后，在人民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彭佩云会长也亲自参加了。这些地方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到现在已经有 20 多年了，覆盖人口 840 多万，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的人群，应该可以回答我们怎么来认识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关系。

这是甘肃酒泉和甘肃全省比较。

项目	甘肃全省	酒泉地区
人口出生率	15.61‰	14‰
人口增长率	9.17‰	7.2‰
计划生育率	85.6%	99.99%
妇女总和生育率	1.9	1.54
一孩妇女比例	29.18%	44.4%
两孩妇女比例	41.12%	41.82%
多孩妇女比例	24.05%	8.19%
妇女综合节育率	88.60%	88.2%
晚婚率	51.28%	64.41%
多孩率	1.5%	0.08%
早婚比	0.36	0.02
计划生育合格村	58.2%	95%

酒泉是二孩政策，它的平均生育水平就 1.5，没有到 2，而甘肃全省实行的是一孩半政策（第一个生女孩，可以生第二胎），妇女总和生育率达到 2。所有指标酒泉都比全省好，出生率低，增长率低，多孩率低，一孩率高，二孩率多一点点。所以不是政策越松生育水平越高计划生育工作越差。这是甘肃省计生委主任亲自提供的资料。

	1985 年	2000 年	2005 年
恩施州	2.83	1.49	1.4
十堰市	—	1.46	1.53

这是湖北恩施和十堰市比较。

十堰是一孩半政策，恩施是两孩政策，但是十堰市生育水平要比恩施高。

翼城这些年来一直实行二孩政策，翼城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的出生率比临汾低，比山西省低，也比全国低。它的自然增长率也是。

年份	人口出生率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翼城县	临汾市	山西省	全国	翼城县	临汾市	山西省	全国
1981	19.27	18.79	21.1	20.91	12.09	15.85	14.4	14.55
1989	20.12	22.96	20.2	20.98	12.82	17.82	13.9	14.70
2001	9.11	13.51	13.06	13.38	3.79	7.71	7.16	6.95
2006	8.76	12.42	11.48	12.09	3.80	6.42	5.75	5.28

乔依德：为什么政策松了反而倒过来了？

左学金：法律脱离实际，大家都违法，反而不如法律比较实事求是，大家都守法较果好。脱离实际的法律等于没有法律，大家都超生。

顾宝昌：翼城人口每年出生数 2000 多，一孩比例很高，二孩比例不断减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因为每年出生数量太少，只有 2000 多人，所以波动较大，2006 年看起来性别比有点偏高，假如把几年搞个平均数的话就正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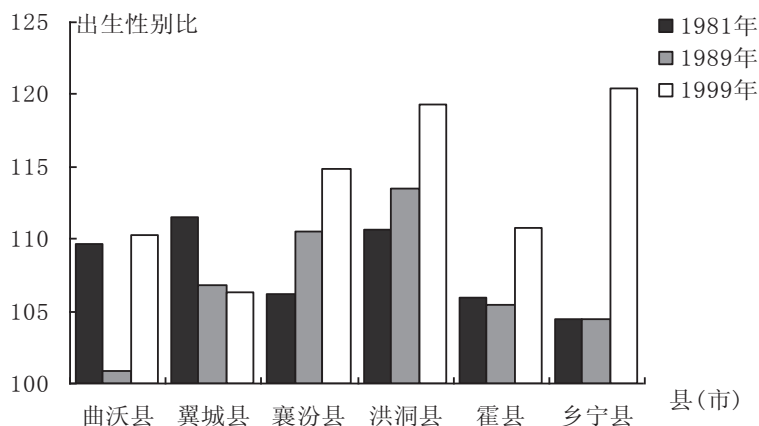
翼城县人口及出生人口状况

年份	总人口	出生数	出生孩次分布 (%)			出生性别比
			一孩	二孩	三孩	
2000	300230	2810	59.9	40.0	0.1	105. 0
2001	301792	2397	65.8	34.1	0.1	104. 3
2002	304143	2500	66.4	33.6	-	115. 1
2003	306537	2503	68.8	31.2	-	106. 2
2004	307992	2535	74.4	25.6	-	105. 9
2005	310612	2421	73.6	26.4	-	107. 5
2006	313689	2735	73.3	26.3	0.4	112. 3

看到翼城一孩率高，二孩率高，多孩率少。

	全国	全国（县）	山西省	临汾地区	翼城县
一孩率	49.4	44.4	43.7	40.0	52.5
二孩率	31.3	33.6	34.4	35.4	38.8
多孩率	19.3	22.0	21.9	24.6	8.7

这是翼城周围的县，临汾市的其他县，它的出生性别失衡相当厉害，但是翼城是在正常范围。（图十）



图十：临汾市部分县市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比较

甘肃的酒泉情况，可以看到性别比基本处于正常范围。而全国出生性别比已经到了 120，不断恶化。

年份	甘肃酒泉	甘肃酒泉一孩	甘肃酒泉二孩
2000	108	103	118
2001	112	110	117
2002	109	106	113
2003	107	107	107
2004	104	104	105

这就可以看到，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干群关系良好，没有恶性事件，而且越来越转向了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计划生育，这样既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又为群众拥护，保持了低生育率水平。应该说这些试点地区的成果很可喜。

有些人说那些地方当时是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再好也还是 20 年以前。应该说全国各地现在的情况，无论从社会经济发展还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水平，都要比 20 年前要大为好转。假如在 20 年前都可以试点，那么在 20 年后的今天难道不能做吗？这个道理说不过去。我们把这些地方的经验汇集成了一本书《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以便让更多人了解这样的情况。

此外，湖北宜昌有两个少数民族土家族的县，因为少数民族自治，经过省人大批准，03 年、04 年政策调整，在城市和乡村也都实行了生二孩的政策（城乡普遍可以生二孩）。后来我请人大一位老家湖北的教授去调查。调查下来发现，实行二孩政策多年以来，结果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都很低，

而且出生性别比正常，总和生育率保持低下。所以当地计生委领导也说，现在可以生了，怎么还不生？就是生不出来。所以即使像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鄂西山区），实行二孩政策也保持了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还有在江苏的调查。江苏的生育政策是一个特例，和其他的省不一样，他们农村也实行只能生一个孩子，20年来农村和城市一样。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个政策，假如说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孩。但是20年前这个政策出来时是空的，因为没有符合独生子女条件的夫妇。但是经过20年以后，独生子女比例越来越大了，能够符合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越来越多了。这实际是从一孩政策向二孩政策的自然过渡。这个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试验田，即假如一旦政策调整，可能对形势产生什么影响？假如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他们想不想生、会不会生？

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其中有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不到10%。然后我们问她们：你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二孩子好。然后我们又问她，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你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是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个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我们正在做下一步的调查。说想生但不生二胎的，和说想生而且要生的，后来这几年做的跟之前说的是否一致？现在正在做追踪调查，结果也马上就要出来了。

在这样一些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于2008年5月在上海复旦开了第二次座谈会。32位学者出席了会议，21位学者

作专题发言。大家把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又进行了互相交流。应该说这个时候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比 2004 年提交建议书的时候又大大向前推进了。大家感到我们过去很低调，但是现在看来应该要走出人口学，要多学科交流；要走出学术圈，面向公众，面向媒体；要走出个体研究，形成研究团队。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我们又起草了第二份建议书，在 09 年 1 月份 30 多个学者分别签名以后报上去了。这里面我们强调要加强对低生育率下人口规律的认识；再次呼吁选择少数地区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希望中央能够放权，允许各地积极稳妥地着手探索试验；避免数出多门，现在人口数几个部门都在出，到底数字怎么来的不知道，要增强决策的透明度；不能闭门造车，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

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已经连续三年在两会上提出要调整人口政策。他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谈到，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吗、人口结构已经成为最主要问题、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人越少越好是误解、刻不容缓不是马上放开，而是刻不容缓地研究。

今年他又提了，我们帮他起草了一个文件，写了要尽快试点，他把“尽快”两个字划掉，立即试点。

为什么对低生育率到来我们的认识往往非常迟缓？不但中国迟缓，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也迟缓。这个是普遍现象，为什么会造成的？在 07 年在复旦召开上海论坛的时候，Gavin Jones 作了分析，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了三个原因，一个就是人口惯性带来的错觉，人口还在继续增多，所以低生育率不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长期控制人口造成了思想定势，在我们决策者和公众很难扭转过来，很难

换眼光看问题；第三个人口转变理论存在缺陷，过去人口理论说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低生育率以后怎么样没有说，人口理论没有回答低生育水平的发展趋势问题。

左学金：以前的理论里只有低增长，没有负增长。

顾宝昌：当时我们大家一心一意把高增长的人口降下来，避免世界崩溃，就像现在哥本哈根讨论气候一样。

所以我们这些年过来，开始时是关注政策调整，后来发现这不仅是政策调整，根本上是对人口形势判断的问题，现在政策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同所致；开始时我们主要注重于对数据分析，后来转向对实践的总结；开始主要考虑呼吁上层，后来我们考虑还要面向公众；开始时考虑国家长远发展，现在感到还要考虑到以人为本，家庭和谐问题。

这些年课题做的并不顺利，但是我们感到现在对低生育率下降人口规律的探索，我们认识越深刻，应对就越恰当。现在我们可以不行动，但是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今天这些人都是当事人。

往前看，中国会怎么样？如果经济未来 30 年说不清楚，人口未来 30 年大概更容易说清楚。一是生育率不断走低，已经 20 年走低了，低生育率效应不断显现出来，希望小学建起来又关闭了，因为没有学生；没有人高考了，不仅是教育全球化的问题，根本上是绝对数量减少，18 年以前就应该知道了，但大家不相信。

左学金：但是还会有回升，因为出生数有一个小高峰。

顾宝昌：问题是上不了多少。

乔依德：有很多民办大学破产了，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 20%。

顾宝昌：去年北京高考人数减少 1.7 万，因为高考人数排除了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只有户籍人数在当地考，所以比民工问题更纯粹一些。可以看到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三年没招满了。

左学金：十年以前去日本，一家大学从校长往下全部减薪 15%，就是因为生源不足，收入减少。

顾宝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未来 80 后、90 后平均每对夫妇会生两三个孩子以上，没有理由相信生育率不继续降低。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低增长率时期，但没有经历过低生育率的时期，我们不知道长期低生育率的情况会怎样。

低生育率的一个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加剧。去年是建国 60 周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所有解放后出生的都将汹涌加入老龄人口，有 50 后、60 后。如果我们不用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而是中位年龄的话，会发现不光是一个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而是整个社会变老的问题，中位数已经达到 45 岁以上。这样的老年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到底我们会面临什么问题？现在很多人在企图说，但是说不清楚。现在说美国是一个唯一的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但很少人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保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北朝鲜都有，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中国是没有的。

桂世勋：现在中国的城乡医保覆盖面在逐渐扩大，当然水平上有较大差别。

顾宝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化。现在城市化速度相当快，每年一个百分点，现在已经到了 47%，很快，中国就要进入一个一半以上人在城里生活的社会。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可以说 49 年没有解决，79 年没有解决，现在

发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乡土社会，今天要消失了。这对社会的影响，恐怕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城市化，其他国家曾经有过都市社会，我们没有，我们是乡土社会。但是现在突然变成城市化，这也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口流动。现在十分之一以上，也就是2亿多人是流动人口。过去世界上和平时期迁移流最大的是墨西哥向美国非法移民，迁移流量最大的。现在中国流动人口实际上是世界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迁移人口。但是中国是一个没有迁移传统的民族，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

左学金：这个说法有问题，中国人口历史上迁移性还是比较强的。

顾宝昌：基本是小农社会，不是游牧民族。

左学金：有的时候是因为战争。

顾宝昌：我说的是和平时期。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突然要变成一种大量迁移，可以预见未来的迁移还要大。这种迁移影响多大？现在不清楚，比如有人说会影响中国人口分布。我觉得这种考虑太狭隘，中国的社会结构、区域结构，文化结构都会发生变化。整个会变成怎么样，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这样一个高度流动起来的中国社会，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是关心流动人口怎么管理的问题，或者农民工怎么市民化？但是对未来趋势。美国国务院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未来趋势，专门派人来中国调查，因为他们感到跟美国有关系。但现在国内对这些问题没有人讨论，国内更关心的是怎么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王桂新：城市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人口流动、城市化当然很重要，因为它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早在 2000 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

顾宝昌：未来几年中国处于长期是一个低生育率的社会、严重老龄化的社会；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广泛流动性的社会。我们现在铺天盖地都是在讨论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定义、小康社会的评估、小康社会的指标……基本上这些东西（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城市化和流动人口）都不在考虑范围，但离开这些东西来讨论小康社会的指标，根本是脱离实际。而且我们说“十二·五”要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十二·五”会成为什么样子？必须要结合这些来进行综合的考虑。

乔依德：最近计生委领导说了，计划生育政策“十二·五”基本不动。

顾宝昌：应该看到，我们今天面临的远远不是一个生育政策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新时期人口形势的判断问题。现在中国人口已经到了历史十字路口，我们将面临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问题。所以现在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不能用老眼光看今天的事情。要允许讨论，因为谁也不能说都搞明白了，假如不讨论不探索，以为都明白了。恐怕不行。（引导发言到此结束）

圆桌讨论

彭希哲：刚才学金说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有问题，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

左学金：国家计生委的“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与后来的实际情况相比，出入太大了。

彭希哲：实际上，从去年9月17日，国家计生委曾经讨论在中国选择十个省进行放“单独二胎（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允许生二胎）”试点的方案。讨论是哪十个省，另外判断一下国家计生委指导意见应该写些什么东西？当时的十个省市是京津沪，再加上黑冀辽，再加上江苏、浙江，再加上重庆和四川。当时有人口学家反映说怎么一开始不放，一放就是放10个，原来一直说要稳步推进。

在这个会议的前几年也开了一次会议，同样的问题，另外一批人，以程恩富为首，那一次会议上则是坚决反对中国放松对人口政策有任何形式的调整。

左学金：有人认为人口下去了，经济就上去了，这个看法本身很有问题。

彭希哲：他也带着一些人在做人口研究，他们也是用数据分析，也有一套结论。政治家不懂得这些，两组东西放在一起没有办法判断。

对于中央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数据吃不准。所有的研究都是说总和生育率就是不超过1.5。但是所有的媒体报道，包括救灾，包括最近的浙江水沟一家死了四个小孩的事情，一看家里小孩都有两三个小孩，没有谁是一个小孩。

左学金：问题是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漏报的部分已经作了调整。由于担心瞒报漏报，人口数据报到省统计局调高一次，报到国家统计局又调高一次，所以有时反而担心是否调过头了。确实有的农民也生得很少，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农民生很多。

彭希哲：现在按照所有实际数据，肯定不超过 1.5，但是国家计生委，包括国家统计局每次觉得有漏报，每次都按照 20% 调，所以一直说 1.8。

当然，去年做了最坏的事情，国家计生委做了 20 个省市的调查，调查现在农村那部分的实有人口，这样一来中国的总和生育达到 1.87， he 就说整个生育水平反弹了。实际上这里面有极大的抽样误差，因为轻壮年都到城里去了，是想要生孩子做月子的才回到农村。所以抽样的误差很大。这样子一来这是一个很坏的数字。可能这个数据是忽悠中央领导人的。他们虽然也知道这个数据有问题，但是还是把这个数据给中央报上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北京来说，国家计生委有一个问题，它牵涉到 40 万计划生育政策队伍，包括这个部委能不能存在下去。所以这个问题由当时主管部门来决定是有问题，因为是利益相关的，不是独立的。

当然，今年除了纪宝成校长，田雪原也写了文章，老田始终强调这个政策是他制订出来的，现在说要改正也是他首先提出来。

左学金：20 年前提出一个想法，现在的看法不一样也是正常的，形势在发生变化。

彭希哲：春节前到北京开会时，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态度是希望稳步推进，当然这个稳步是非常慢地推进，因为要

改正的压力很大，不动肯定不行。但它想不引起任何影响，也不让人口学家参与公开的讨论。所以田雪原的文章和《南方周末》专文出来以后，国家计生委觉得很被动。1月4号计生委主任向温家宝作过一个报告，温家宝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动。总理这么一讲呢，计生委马上退回来，他们本来也不是非常情愿推这个事情。接下来有副总理的讲话，计生委马上传达了。可见国家计生委在这个事情上是很被动的。

但是在过去10几年、20几年中间，包括顾老师，桂老师，我们几个都是在国家计生委专家团里面，一直在提调整生育政策这个事，一直在给计生委做方案。实际上我感觉有些计生委领导也不是没意识这个问题，比如张维庆做计生委主任的五年里是反对的，等退下来到政协里，就开始提出要改正。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对整个中国未来人口，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会有很大问题。

对于人口增长本身，我很简单说一下。没有一个政策是可以长期持续的，而且实际上对未来人口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很清楚。

我同意老顾的说法，不管总和增长率是1.4还是1.8，大趋势是这样走的，差一点不在乎的。所以这个时候政治家要看大势，而不是拘泥于这种数字，不是1.5，1.6调不调的事情。上海首先要调。但上海碰到一个问题，上海计生委主任实际上是很想调的，但是不敢在北京说什么。包括李斌做了计生委主任以后，也关照说上海不要出头，因为上海在全国影响太大了。

左学金：上海人口变动可能比全国早20年，我们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是1970年代，全国是1990年代。上海户籍人口从1993年开始就已出现自然变动的负增长。

彭希哲：所以这件事情上海无论如何要重视。而且上海要改，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上海经济达到这种水平，生育率已经低到这样的程度，93年人口已经负增长，没有任何一个省市有这个水平，上海完全可以调，这个道理和中央讲完全可以讲清楚。而且上海养老基金，每年都有那么多亏空，今年又是100多亿，以后每年都要亏，亏到最后受不了的。所以上海肯定要调。

但是怎么调？学界当中也有不同想法，比如“单独”放开，整个放开，有各种方案。但我自己觉得，从调人口政策来说，最根本的政策考虑是还权于民，而不是说到1.7，1.8。政府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调控的思想范式。要把生育的权利还给老百姓，上海一直是0.7、0.8的水平，按照政策都没有生满，现在即使让老百姓生两个，最后也超不过1.5。所以这个东西我感觉上海要领先。

这个对中国政府是得分的，而且对未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得分的。美国人一直攻击人权，放开生育政策将会是我们做的一件改善中国人权非常好的事情。实际反弹效果也不会有。其实，上海真正要花心思的是如何鼓励生，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乔依德：这里可以应用其他地方的例子，已经出现低生育率的地方，想让它再起来很难，比如台湾、日本。

彭希哲：台湾内阁鼓励老百姓来提出口号，怎么鼓励生二孩，悬赏好的口号。

桂世勋：香港政府鼓励民众最好生三个。但是他们没有利益导向机制，尽管讲最好三个，但是上不去。

彭希哲：我自己感觉，人口学家当然集中重点讨论人口政策本身。但是另外现在的结构问题，老顾刚才说的4个。

这些结构不是靠人口政策调整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狭义的生育控制的政策，其它还有相关的户籍政策，老年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这些实际都是广义的人口政策。我有时候有些担心，如果我们过度把目光限制在生育控制调整中间，我们会忽视对其他相关政策的调整。比如，计生委一直说实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生了四亿，好像是它的功劳，但这肯定不全是它的功劳，没有计划生育，生育水平也会自然下降，当然不会下降这么快。反过来说，如果少生四亿全是它的功劳，那么同时就要承认少生四亿人同时所造成的所有问题也都是计生委造成的，这是它不承认的。

我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其他一些东西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将比人口政策调整更加困难，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养老金体制改革。政治家很容易把出现的问题全部归到人口，说因为人多了所以出了问题，这样可能规避了责任。比如分配不公的问题，解决分配不公涉及到体制的根本变化，但是很容易把这个说成是人口的问题。

所以如果要考虑“十二·五”长远问题，必须把这些放在一起考虑，人口只是一个背景，形成人口环境和人口要素。解决了人口上的结构问题，从长远来看肯定有利。但是在另外的角度，必须同时进行其他的改革，这样的话才能把人口的红利，未来人口负债以及整个社会公平和小康社会建设整合在一起。

王桂新：老彭后面有会先讲走啦，我晚上六点半要上课，所以我也先讲吧。我讲几点看法，先谈生育政策问题。应该说，我是比较早地提出上海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大概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根据上海户籍人口 1993 年开始

出现并连续几年的自然负增长，我就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提出上海应该根据这一变化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记得当时遭到一些区县计生委领导的强烈反对，可能那时候条件还不成熟或不具备调整的条件。到现在上海户籍人口甚至包括常住人口仍是自然负增长，而且已经持续十几年啦，总和生育率已经长期徘徊在 0.8 左右，一直低于 1，这是一个人口集团将要很快灭绝的水平，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的确已经到了不调整不行的地步啦。针对全国的情况，我也主张应该尽快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我也并不同意老顾你们调查的生育率为 1.47 的说法，因为我不太相信现在我国的真实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的这么低。

顾宝昌：是政策要求达到的水平。

王桂新：但是现在看到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大学里的一些大学生和研究生，问下来一般都两、三个兄弟姐妹，一个的很少。由此推断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不会下降得这么低。

左学金：你要综合一下就少了，我们在座的都是一个，而且那还是 20 年以前生的。我们现在讲的一点儿，是现在，不是 20 年前。

王桂新：现在我们的学生兄弟姐妹一般都是两、三个，他们出生的 1980 年代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抓的很紧的时候。这几年好象不是那么紧啦，怎么可能会这么低呢？这个水平已经接近日本的水平，日本 2008 年大概是 1.37。如果真那么低，那问题就更严重啦。我的意思是，由于我们国家做什么事情都搞泛政治化，GDP、计划生育指标都是政治，都事关地方官员的升迁，搞得大家都作假，很难得到一个真实的统计数据。

左学金：1980 年代生育率没有明显下降。

王桂新：不争论这个问题啦，这不影响我们得出一样的结论，形成共同的看法。现在我主张我们国家要尽快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且我觉得并不一定非要提 1.47 或者已达到如何低的水平，我认为只要是低于更替水平，低于 2，就应该考虑做适当调整。我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1.4、1.5 才需调整，低于 2，1.6、1.7 也应该调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口生产代际繁衍周期比较长，人口增长惯性很大，特别是常态下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很难改变。这就要要求及早调整。

看起来，现在反对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上都不是人口学家，好象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程恩富等人。这些人不懂人口学，只凭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包打天下，反对大多数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当然，也有少数人口学家反对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如社科院人口所的李小平。不过，他们两人虽然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一致，但是依据是不同的，好象李小平不屑程的主张。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按照程恩富、李小平他们的观点不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肯定是不行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研究讨论了很多年，根据现有人口转变理论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实践，都已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是难以逆转的，一旦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很难使它反弹上来，也就是说常态下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几乎都是不可逆的。如果说现在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还包括计划生育的政策效果，或者说还受计划生育政策的一定影响，那么我们现在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还会对控制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发展到总和生育率已完全表现为市场行为所决定的常态下降趋势，那么再怎么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啦，因为太迟啦。现在如果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还受计划生育政策的一定影响，我们就要尽快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要错过能有效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效果的良好时机，重犯上述一些国家或地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

刚才乔先生讲的刘易斯拐点，前面我说了，现在社会上可能误读了蔡昉的观点，他好象并没有说现在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我的看法是：首先，不同的人口预测结果不一样，我们国内的预测结论一般都是说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出现在 2020-2025 年期间或前后，联合国的预测是 2015 年前后，我基本倾向于国内的预测结论，因为联合国预测这么多国家，只能使用考虑因素比较少的简单方法。考虑因素少，可能会影响其预测结果的正确性。其次，即使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高峰，也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就到了，人口红利就要消失啦。我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 60% 以上就有人口红利。所以即使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高峰，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要消失啦，仍然可以继续享受人口红利。第三，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和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如果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会释放出很多剩余劳动力。何况现在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还几乎都是非完全转移，还和农业、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我们现在讲要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不需要一定要扯上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了。

乔依德：最近出现可以说是民工荒，我记得你和彭教授在《东方早报》说，不一定同意叫民工荒。我最近刚刚看到《中国经营报》上采访蔡昉说，民工荒预示中国红利即将结

束。

左学金：民工荒看你怎么定义？广东招不到工，这不就叫荒了吗。

乔依德：蔡昉预测 2015 年是人口拐点。

左学金：他说 2015 年是拐点，因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是负的。如果退休年龄不变，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要大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劳动力总量会减少。这个是已经确定的，不会改变了。

王桂新：所谓民工荒的问题很复杂，它不光是人口问题，还有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很复杂。用这样的民工荒来判断刘易斯拐点太简单化了。所以我不太赞成民工荒的说法。

桂世勋：这里面的关键在哪里？他用来衡量我们国家劳动力的数量，喜欢用 15-64 岁的数据。去年我在《人口研究》上发表了 8000 字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保障 60 年回顾及探讨，我指名道姓批评了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他们公布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是 15-64 岁分组。我说按照联合国从 1982 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开始，它所有的文件已经把 60 岁作为老年人的起点。因为把 65 岁作为老年人的起点，只是有时候为了与有些发达国家进行历史上的比较，或者有时候拿不出 60 岁以上的数据。因为实际上中国到 65 岁退休退出劳动年龄的很少。因此按 15-64 岁分组会高估中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蔡昉根据这个的观点，就认为 2015 年 15 到 65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了，劳动力短缺了。实际上根据我主持的预测，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尽管在 2011 年后进入负增长，但是是非常缓慢的负增长。

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9 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公报，第一次列出了 15-59 岁多少，60 岁以上多少，其中 65 岁以上多少。可能是因为我在人口研究发表文章起到了作用。

左学金：如果把老年人口的定义提前到 60 岁以上，那个拐点不是更早了吗？

桂世勋：你一会儿看我主持的预测，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的预测是在未来 100 年，有 10 个方案，按照其中的中方案，预测 2011 年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然后慢慢减下来。2000 年时候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 8.3 亿，2005 年开始进入 9 亿，然后 2011 年达到最高峰，但是降到 9 亿以下要 2025 年左右。也就是说从现在到 2025 年左右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始终维持在 9 亿以上，有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劳动就业的压力存在。所以不存在现在劳动力短缺，民工荒是局部地区的结构性的短缺。

顾宝昌：总量掩盖了劳动力结构老化的问题。

桂世勋：这个可以讨论。总之我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或不久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观点。

左学金：但是退出的人也很多，50 年出生的是 2010 年退出。65 年出生的是 2025 年退出。

桂世勋：总的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还在 9 亿以上。

顾宝昌：总量给领导人一个误解，觉得劳动力还很庞大，但是没有看到年轻劳动力在大量减少，民工荒有时候就是年轻人找不到嘛。

桂世勋：你说的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你也要看到，“千方百计增加劳动就业岗位”这句话我相信到“十三·五”还会讲。这个时期始终在 9 亿以上。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推迟退休年龄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现阶段还有国际金融危

机的影响。

王桂新：我再谈人口老龄化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和前面讲的生育率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主要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才造成了现在迅速发展的老龄化。生育率再持续下降下去，就不只是老龄化啦，还会出现人口减少。就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人民论坛》等刊物要我写了一些东西，里面也都已讲了我的一些基本观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啦。我觉得现在大家似乎对老龄社会的问题还普遍认识不足，我现在就简单强调这一点。大家知道，一个人一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基本上呈一个倒“U”字型的变化，就是说人到了八、九十岁以后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又和托儿所、幼儿园阶段的水平差不多啦。由此你可以想象，到了高龄社会，高龄人口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将会是一幅什么图景。2008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达22%以上。你去看一下，不少五、六十岁的人什么不干，整天在家里照顾自家的老人还累得够呛；在有些主要收留高龄人口的养老院，一个护理师只能照顾三几个老人还忙不过来。今天看到报道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开车撞到人啦，明天报道又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把车开到人家里去啦。这些都很有直观，简直“惨不忍睹”。其他劳动力问题、财经问题、国防问题等一大堆问题就更不用说啦。

关于上海的老龄化问题，我曾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我以前写过一本关于上海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的书，里面很详细地考察了上海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分析了老龄化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影响。我在书里也做了上海户籍人口的预测。到目前为止包括桂老师有很多预测，左院长也作了一些预测，比较下来我还是觉得我的预测比较好，至少最接近

实际。我是 1997 年做的，当时预测的现在的人口规模和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老龄化水平）这两个重要指标，都非常接近实际数据，误差很小，预测很准。对这点我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由于上海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及水平在全国是最早、最严重的，主要由此所决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及水平在全国也是最领先的，所以更要重视上海的老龄化问题。在这里，我想主要纠正一种错误的认识。有人认为，上海只要多引进外地年轻人老龄化问题就可以解决啦。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这一做法，或许对解决宏观层面的老龄化问题有用处，但丝毫不能解决微观层面的老龄化问题，如一般只能主要依赖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才能较好解决的老人照料和护理问题。将来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高度重视。

最后我谈一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就谈上海吧。本来，农村人口迁到城市来就是城市化，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一个农村人如果觉得他迁移到城市会得到比其他选择更大的利益，他就可能要选择迁移到城市；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如果他认为接受这个农村人迁进来得到的好处大于他迁进来带来的弊病，他就应该接受他迁进来。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给城市带来了更大的好处，但他们得到的却很少。城市在收获农村迁入人口的“红利”、享受他们带来的大量好处的同时，却拒绝接受他们，拒绝他们完全城市化，相反还以他们增加了公共基础设施压力、使社会犯罪增加等种种理由设置门槛，阻止他们迁进城市。所以我一直不赞成搞什么“蓝印户口”、“居住证”等所谓的户政改革。因为多一种这样的“证改”，就等于多设一个门槛，多一层限制。更主要的是，这样的改革不仅违背公平、公正等普世原则，造成劳民伤财，

白白浪费广大纳税人的银子，而且还把人才、人口“一网拒外”，严重限制了上海的人口集中和人力（才）资源的增加，削弱了上海的人力资源优势。其实上海很早就开始议论搞居住证，开始我也曾参加过几次会议。我曾提出一个思想，就是参考庇古税理论，你如果认为一个外来人口迁进来给你带来了许多不经济（或损失），你就评估一下他带来的这个不经济有多少，他如果要迁进来，就要他补偿这个不经济。但你不能以种种理由拒绝人家迁进来。我考虑，可以想办法把外来人口迁入对上海造成的不经济进行量化，然后参考庇古税理论叫迁入者进行补偿。这个补偿完全由个人支付可能有问题，有没有可能也让用人单位分担一部分，或者用人单位和个人协商进行补偿。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把权利放到了企业用人单位，也不要政府来管来破费。这只是一个思路，可以讨论。现在，政府管的实在是太多啦。不客气地说，现在政府对城市的一些管理举措，不少都是在阻碍城市的发展。

左学金：有一个问题，你说外来人口对上海的贡献是负的，所以要让他补偿。但这个假设有问题。拿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来说，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年轻人进来，将来城保麻烦了。不是说人家给你负担，是要让人家帮助你。

王桂新：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认为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贡献远远大于他们得到的。我上面所说的意思是，你即使认为外来人口迁进来对你带来不经济，你也不应该设置种种门槛硬不叫人家迁进来，所以才提出采取这个办法，让他们能够先进来。外来人口能迁进城市，城市化才能得到真正地健康地发展。

乔依德：但如果要企业出一部分钱的话，企业肯定优先雇佣本地人。

王桂新：户籍人口 1993 年就开始自然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啦，企业很难找到当地人。

左学金：当地人还有贵族化，苦活不愿意干，高级的活干不了。

王桂新：上海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是上海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入，上海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达水平。上海的科技创新队伍，以及上海一些获得科技进步奖的专家，很多都是外来人才。去年热炒居住证改革最后公示获得居住证的 29 人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 93%，还有 2 人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你说，对这样的人才，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不应该早就给他们户籍吗？真是聪明人做糊涂事啊。

左学金：你也不要光关注高科技人才，你今后可能也会有保姆荒，清洁工荒等等，上海的劳动力市场不是光要博士、教授，还有很多人。这些人进来也都是市场有需求他才进来的，你不要他，他回去了。

王桂新：是的。我再对城市化和房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今年我招博士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未来还将有三、四亿农村人口迁到城市里来，在现行户籍制度下是否必然导致房价必涨不跌？我觉得好几位考生的回答都不错。

现在不少开发商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经济学家都在忽悠大众。为什么这样说？根据全国和上海的调查，我也在上海对外来人口进行了三次调查，在被调查的包括层次较高白领的外来人口中，自购房比例虽然在逐年上升，但还是没有超过 8-9% 的水平。如果未来有三、四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里来，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即使按照 10% 的自购房比例推算，也就累计需要三、四千万套房子。而根据有关调查数

据，我国 660 多个城市现有空置房 6540 万套，可供 2.6 亿人居住。你说，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这样的城市化能必然导致房价必涨不跌吗？当然户籍制度一调整，可能会有变化。但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应该是这样的。这个要影响到我们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化也要讲质量，不是不要质量。

刘焜松：在座都是人口专家，我不是研究人口方面的，有些东西本来不想提的，但是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尤其关系到“十二·五”和“十三·五”的问题，所以有些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

第一个，刚才听了教授的发言，感觉好像人口出了什么问题。我现在搞不明白人口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现在人口很正常，没有出问题。

现在说计划生育政策要调整，从长远来看肯定是要调整，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何时调，如何调？何时调，现在有没有比较有明确的时间界限，是不是已经迫切到需要“十二·五”和“十三·五”要调整，未来 10 年是不是马上要调？

大家谈到老龄化，老龄化到底有多可怕？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有没有？是否都是负面的影响？到底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个人觉得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人口总量的问题，是一个人口素质的问题，这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任何政策有两个方面，不能只考虑一面，只看到政策的负面东西，而不看它的有利一面，在制订政策最终政治家权衡的时候一定是两利相权取其重。没有说一个政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还有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多大的人口规模比较合适？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说现在人口不能下降？人口不能下降

是否意味着以前的社会是很差的社会？以前的社会全世界只有 10 亿人，20 亿人，30 亿人，40 亿人，现在到 60 几亿人，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为什么人口不可以减少？

左学金：人口必然是下降，不是可不可以下降。

刘焜松：下降以后到底有多可怕？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些问题搞清楚以后才能把发展的问题搞清楚。还有一些问题，人口和国力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人口多国力强？人口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我看了研究比如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长 1 年，推动经济增长 9%。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人口和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

左学金：你是想弄清楚人口减一个百分点然后 GDP 长多少？

刘焜松：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长 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 9%，他们作了很多研究，是这样的结论。

左学金：按照这样应该美国比中国增长快。

刘焜松：美国是比中国发达，他们人均 GDP 比我们高很多。我们现在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8.2。

左学金：究竟是因为富了教育才好了，还是教育好了才富了。

桂世勋：他是在假设，有很多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是这样。

刘焜松：我只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人口的素质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关系，如果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口的素质对经济增长如此重要，那么我觉得人口数量适当下降一点，并不是很可怕。

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搞研究的时候已经完全把这个目标忘记

了。我觉得就是国家强大，人民富裕，所有的政策都要围绕着这两个东西来。计划生育政策从长远看肯定要调，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是否已经紧迫到要在“十二·五”、“十三·五”调整？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强大，影响了老百姓富裕？如果在未来10年当中不需要调整，我觉得这个我们就不应该把它作为重要问题了。

乔依德：我帮他总结一下，一个一个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间调？是不是“十二·五”、“十三·五”迫不及待必须调，或者还可以拖一下？不调有什么负面影响？

顾宝昌：刘教授提的问题非常典型，很有代表性。我是这么看的。第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是在人口过快增长，生育率过高的情况下看人口问题，现在我们在人口增长越来越慢，生育率越来越低，低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来看人口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口环境。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还是用过去那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人口问题，所以导致这个问题说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也希望中国的人口今天一下子变成6亿的话，我们会非常高兴，但人口不是说想变就变。就像经济问题上，现在大家也知道经济发展如果过热过冷都是坏事。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觉得人越少越好，恨不得明天要减掉3亿人，这是要出问题的。就像经济里面也有规律性的东西，人口的规律性问题比经济规律性更死板。

刘焜松：你觉得中国人口适度规模到底是多大？

顾宝昌：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想适度就适度。我们现在人口问题上，就像经济学经过这几年的挫折，大家慢慢意识到了经济有规律性，要按照经济规律性办事。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没有应用到人口问题上，以为人口像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这种想法很危险。

为什么要紧迫？假如说经济上，中央明年给你 3000 亿，明年 GDP 可以上几个点，但是人口问题上不可能。因为一年就长一岁，三年就长三岁。我们之所以现在要调政策，是因为今天调了的话，20 年以后这些人才能进入劳动力，也就是当 2030 年我们老龄化最严重的时候，这些人进来，缓解这种情况。假如说 15 年以后调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后果会由今天的 80 后、90 后来承担。所以我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今天的人你可以做任何决定，但是你要对历史承担责任，包括领导人。

刘焜松：现在不调政策，最大的危害谈到了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有那么可怕吗？抚养比高嘛，但社会在发展嘛，人均水平上去了。

左学金：第一，人口下降，不是说是为什么不能下降？实际上，现在人口增长是惯性增长。就是生育率和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生育率少了，本质上已经下降了，但是上一代没有死掉，又生出下一代。所以尽管生得少，人口还是增长，这个增长是惯性增长。

而从 90 年代初开始，我们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已经维持了 20 年。所以未来人口负增长是必然的。不是说为什么不能下降？下降是必然的，肯定要下降。

问题是，这个下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还是一一定要通过行政手段，通过对公民的生育进行控制？这个控制代价很大。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用政府来规划家庭的生育行为。

王桂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再持续发展、持续下降下去就将转变为自然行为，转变为不可逆的常态趋势，这样就很难再改变，会一直下降下去的。

左学金：这个后果是改变不了的。全世界很多国家曾经有过物质生产计划，但是效果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连计划经济都要向市场经济发展，那么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还有多少理由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呢。而且在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中计划到人口的，中国也是唯一的。

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人口控制？如果下降的趋势是必然的了，为什么还要通过政策控制它？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在国内国际，党群关系方面都是有代价的。你刚才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但是富裕要紧还是幸福要紧？

刘焜松：富裕和幸福是有关系的。

左学金：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误解，以为少生孩子就富裕了。

刘焜松：那也不意味着多生孩子就富裕。

左学金：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孩子多的老年人生活水平好啊。计划生育父母困难很多，这是人家做过研究的。没有什么收入来源，现在一个月补贴也就 50 块钱，年纪大了小孩少，在农村里是很麻烦的。你指望谁给他解决问题？

你说要国富民强是对的，但是你把生育和这些目标联系起来，就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一定少生就幸福和富裕。

刘焜松：这倒不是，我没有这个观点。我只是说为什么人口不能下降。

王桂新：不是不能下降，而是下降、减少以后就一直减少下去。人口减少也是生育率下降的后果，而且也是老龄化发展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老龄化基础上出现的人口减少比老龄化更可怕。现在日本最担心的好象就是自己人

口的减少。

刘焜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的绝对规模都下降了，后来鼓励生育，婴儿潮出来了，人口增长很快的。

王桂新：你说的那是非常态的人口减少，现在我们讨论的是遵循人口转变理论的常态的人口减少，这种常态的人口减少将表现为人口的自然负增长。这种常态的人口减少趋势是很难改变的。

左学金：现在日本人担心，韩国人担心。

刘焜松：韩国人不担心，日本人也不担心。

王桂新：哪里不担心，现在日本提出很多移民计划。

刘焜松：他们如果真的担心很早就采取措施了。

王桂新：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早就开始采取措施啦，但措施效果很有限，所采取的措施已经不能改变其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趋势啦。应该说，他们还是觉得采取措施有些晚了。

刘焜松：哪个政府说后悔采取晚了？

王桂新：可以找到很多文献。对不起，我要赶回去上课啦。

左学金：日本现在是 1 亿 2 千多万人，你知道厚生省预测到本世纪末是多少吗？

刘焜松：和俄罗斯预测一样，俄罗斯原来是 9 千多万人，因为酗酒，寿命短。事实上这都有一个假设前提的，未来 90 年当中永远不采取措施。

左学金：日本已经采取了很多鼓励措施，但是在给定的政策下预测到本世纪末是 6000 多万人。现在还是负增长，没有正增长。到本世纪中叶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 65 岁以上

的，护理的成本很高。

刘焜松：我觉得生育方面的政策调整当然是需要时间，但是绝对不是下去以后就不能上来。它的时间滞后期最多也是 15 年 -20 年。所以要做 90 年，100 年的预测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原来关于中国的人口预测出现了这么大的差错。

左学金：人口问题可能比你直观的感觉要复杂一点。

桂世勋：关于人口结构变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刚刚顾老师，王老师都谈了一下，我大部分同意他们的建议，但是有的也有自己的保留看法。

一个问题是现行生育政策是否需要改变？我加了一个“现行”。现在实际上有三派意见，一派说老早就要改变了，还有更早的，认为 05 年甚至更早就要改变了。一派说不要改变了，李小平和程恩富的观点。李小平是从人均思路考虑，说如果我们国家总人口减少到美国那样两亿多，那么人均经济发展就达到美国水平。程恩富从劳动力角度考虑，说我们现在劳动力太多，影响很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现在要不要改变呢？我主持了 21 世纪 100 年的中国人口变动趋势预测，假设未来总和生育率变动四个方案，我们看看老年人口的系数，因为最近马力（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发表文章，她说生育政策改变对人口老龄化作用有限。我认为关键她没有看到 2100 年。我们现在调整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假设是 2.1，如果按照现在是 1.5，用这两个生育率来预测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在 2050 年看不出明显的差别，但到了 2100 年差距就会非常明显。

刘焜松：人的行为、习惯会在 90 年当中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做这么长的预测。

左学金：60 年后的老年人现在已经出生了。今年出生的 60 岁，去年出生的 61 岁，这是已经确定的事情。未来的老人，绝对量只受死亡率的影响，不会有大的改变。

桂世勋：另外，对总人口的影响，2050 年高、中、低方案影响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到了 2100 年老年抚养系数差距拉大了。100 年以后，从长远看影响就大了。

2089 年前的 80 岁以上老人现在已经活在那里了。按照平均预期寿命的假设，按照 2000 年普查的数据预期，从现在到 2080 年以前，在假设不同生育水平的预测方案下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基本不变，但是占总人口比重差距大了。2000 年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重接近百分之一，到 2100 年，将要到 10% 左右，10 个人当中有一个 80 岁以上的老人。老年的医疗、照料负担非常大。日常照顾比例，看看中国老年人 85 岁以上需要照顾的约占三分之一，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这个问题会非常突出。

另外，独生子女夫妇进入老年，特别是进入高龄以后，对他们照料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中国 20-29 岁女性人口数，各种预测可能有些不同，但是趋势是一致的，在 2011 年进入高峰以后，要一直减少到 2025 年左右，然后再回升上去。我们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预测的 20-29 岁女性人口数据可能有一点出入，但是波动曲线图形是一样的。

关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到什么时候调整？我在 2007 年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写了《适时适度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呈上去的。我认为最好是在 2015 年以后中国 20-29 岁女性人口数下跌较明显的时候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放开生两个。因为 2015 年仍超过 1 亿，2025 年将减少到不

足 8 千万。

左学金：你说往下降的那个图，一个峰一个峰在人口学当中叫“回声”，80 年代有一个生育高峰，20 年到 30 年以后又有一个高峰，但是每次高峰会弱一点。这是一种代际的反应。

桂世勋：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到 2011 年、2012 年出现峰值，然后缓慢下降，根据上面三个方案里面，到 2005 年开始进入超过 9 亿，2025 年左右再减少到 9 亿以下，所以在这样长时期始终在 9 亿以上，这是全国人口。所以我认为现在并不出现所谓 2015 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出现短缺的问题。关键是地区性、结构性的短缺。

顾宝昌：他只看劳动力总量，不看劳动力年龄结构。

桂世勋：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我始终认为现在的问题从中央来说，不存在永远不调整。尽管程恩富、李小平这样讲，我认为中央并不会采纳。

关键我们研究，究竟在“十二·五”期初调整，还是在“十三·五”期初调整，哪个好？为什么需要调整？我认为现在看现行生育政策要不要调整？我把它概括为 5 个“有利”。

第一个，有利于从宏观上减缓未来，特别是 21 世纪下半叶，人口老龄化过于严重和老年抚养比过高的问题。我们重点看宏观影响主要是 21 世纪下半叶。现在大量预测都是到 2050 年。

第二个，有利于从微观上提升未来“4-2-2 家庭”（4 个老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的比例。我们不希望大部分家庭的代际结构都变成“4-2-1 家庭”，因为这会严重削弱家庭的养老功能。当然有一部分不生，或者只生一个，我们没有

办法，这是自主选择。但从我们政策来说我们希望未来的家庭代际结构中“4-2-2 家庭”比例能够大些。

第三点，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这个刚才顾老师也谈了。调整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是有正面效应的，但是效果是有限的。它的正面效应在哪里？我写文章发表了，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可以稀释男孩出生性别过高的浓度。如果在农村第一个生了男孩以后也允许他再生一个的话（现在政策规定农村夫妇第一个生男孩不能生第二个孩子了），那么生男孩的家庭至少对第二个孩子性别不会太顾虑，大大减少如果怀了一个女胎就一定引产的情况。从总出生人口来说出生性别比相对会降低些。因为相对于每出生 100 个女孩来说，出生男孩的人数会减少些。

第二个作用是，如果在农村生了两个男孩，就有可能让其中一个男孩从妻居，到女方家里居住。这样对第一个是女孩的家庭，有可能减缓对第二个孩子的男性偏好。

生育政策放宽对出生性别比有影响，但是不会太大。我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还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低水平和生育文化的影响。有少数人富了还想超生，希望男孩，就是生育文化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的生育男孩偏好，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很低，要养儿防老。

第四个，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发展。事实上生两个小孩和生一个小孩相比，生两个小孩更容易有竞争，更容易培养相互关心的品德。生一个容易宠坏。这个原因不完全是因为只生了一个，但是影响因素还是很大的。

第五点，有利于减少因独生子女不幸伤残和死亡，给家庭带来的沉重压力。我实地调查特别是到苏州、无锡，独生

子女严重伤残的，父母非常伤心，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还担心父母走了以后他们怎么生活？如果生两个，比如谢晋，一个孩子有认知功能障碍，另外一个孩子认知功能健全，至少感到我还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现在生一个，如果生一个严重伤残，他就怪生育政策。你允许他生两个，他只生一个，一旦发生意外他不会怪生育政策，因为是自己少生了一个。

我是从以上五个有利来看为什么说现行生育政策要调整。现在也有少数人认为，我们在 1980 年不应该实施普遍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有的学者认为在 80 年提出实施现行生育政策是重大错误。这里涉及到对前 30 年中国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评价，是不是搞错了？是因为搞错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调整？还是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在过去 30 年中利大于弊，现在弊端慢慢显露出来，需要 we 与时俱进地进行适当调整。

顾老师讲的前面我都同意，但是你关于未来 30 年的分析，我觉得过于悲观了。你是建立在未来 30 年现行生育政策一直不调整的情况下，但现在除了少数人说未来 30 年不要调整以外，我看从中央决策部门没有一个人说现行生育政策在今后 30 年内不要调整。

左学金：他是以生育率为假设的，问题是即使生育政策放开了，生育率就会上去吗？

桂世勋：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中央，“十三·五”调整和“十二·五”调整到底利弊得失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调整？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时候调整？一个是选择合适时机以后采取什么办法调整？这里又有很多不同意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他说的是刻不容缓开始研究，但是记者给他的标题是“放开两

孩刻不容缓”，这是不同的两个“刻不容缓”。

我认为如果放开可以采取“软着陆，双轨制”的办法。

“软着落”就是在完全放开生两个孩子前，对现行生育政策“微调”，先允许农村“单独夫妻”（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个。现在全国只有7个省市实行这个政策，大部分省市包括北京连农村“单独”都没有放。除了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些地方，城镇“单独”可以生二胎也完全没有放。所以“软着陆”就是首先允许农村、城市的“单独”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按照我们国家决策程序，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制定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研究方案到最后实施，恐怕也要有四、五年时间。我估计全部“单独”夫妻都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的“时间表”即使准备好了，最后也要到“十二·五”期末、“十三·五”期初，才能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这个时间也正好就是我才所说的20-29岁女性人数开始大量减少的时期。

另外“双轨制”也涉及到怎么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有些人提出，如果决定调整，从那天开始，每对夫妻都可以生两个孩子。但采取这种方法国家要承受一个什么风险呢？如果说中国有一千万或者几千万人独生子女父母要退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了，到时还可能会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来指责你，国家承受得住吗？

据上海的调查，现在有一部分30岁以上，收入比较高的白领，不符合“单独”条件，但他们从将来养老和小孩成长方面考虑希望生两个孩子，而且不担心养不起。我那天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问我她能生两个吗？我说按照现在的政策你不能生两个，因为她连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条件都

不符合。所以我的一个设想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说 199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女孩子，结婚以后都可以生两个。那么以前出生的，你就在老的轨道里面，按照“双独”、“单独”允许生两个的方法走，或者将来逐步可以把老的可以生两孩子口子不断再放宽。

乔依德：以前的承诺，比如退休时独生子女证有什么好处，还是要兑现。

桂世勋：我认为具体从哪一年开始生的女孩将来婚后普遍允许生两孩可以再研究，但“软着陆、双轨制”方案可以减少调整的社会成本和社会震荡。

左学金：现在各方面生活成本都很高，“单独夫妻”和“双独夫妻”要养两个其实也很累的。

桂世勋：有些专家曾经做过预测，预测也很精细。比如先从 35 岁开始放开，可以生两个孩子，然后过一年提早到 34 岁，再过一年提早到 33 岁，逐渐向低年龄育龄妇女放开，这也是一种方案。我感到计算机做非常精细，也是合理的。但在政策上过一年提早一岁放开生两孩，其可行性怎么样还可以研究。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我认为招工难的问题是局部地区的现象。还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至于人口红利，国外的专家用 0-14 岁少年儿童人口加上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如果小于 50% 就认为是处于人口机遇期，或者有可能获得人口红利的时期。按照我们预测，中国要接近 2030 年。因为方案不一样，大概在 2030 年前后，也不会说到 2015 年人口红利期就结束了。

左学金：拐点主要是说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是不是还能

成立？需要更多的工人必须增加工资时，就表示拐点已经到来了。

桂世勋：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算法，上海市户籍人口的人口红利期大概在 2020 年结束。若以常住人口来算，那 15-64 岁人口大大增加了，红利期会大大延长。

现在国际上应对人口红利期主要有两个做法，一个是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健康和教育上的投入，另外一个就是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因为即使劳动力很丰富，受教程度也很高，但是离开了就业，找不到工作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没有促进作用，反而还会带来社会震荡。

至于你们提出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讲一些观点。刚刚刘老师提出老龄化是否也有正面效应。老龄化有正面效应，我在很多研究报告里面都写了，主要有三条。

第一，在人口老龄化初期会出现一个劳动力数量比较充沛，总抚养系数比较低的，有可能获得人口红利的时期。这个也是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在一段时间内，虽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仍有 20 年、30 年人口红利期。

第二，由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提高，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因此使得低龄老年人有可能很好的再发挥经济社会作用。关键是现在中国就业压力太大，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所以马上要推出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不成熟。其实我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预测上海推迟退休年龄最好是从 2010 年开始，因为根据我们预测，在 2010-2020 年间如果说迁移政策按照常规没有重大的改变，15-59 岁户籍人口数至少减少 150 万，逐渐推迟退休年龄并不会加剧户籍人口的失业问题。

在上海实行推迟退休是合理的。但强制退休是全国性的

政策，中央没有授权说上海可以试点，所以上海就搞了一个柔性退休制度。上海只能小步推进，先易后难，慢慢渐进。

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难点在哪里？有几个和地方财政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至少现在在大城市里还不能实现。

首先就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当中的低保，我认为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说外地农民工到上海，符合上海市民领取低保的条件的就可以享受上海的低保，这肯定很难做到。养老和医疗保险有很多新政策。最新的是去年开始北京、天津、郑州、重庆、杭州，把新农保推广到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强调户籍，只有本地户籍的农民或者没有纳入城镇的城镇居民才能享受。为什么把新农保取消？因为北京 2009 年 1 月 1 日以后开始实行的新农保是地方财政一个月给 60 岁以上的北京农村户籍人口 280 元钱，前提是子女符合条件必须参加养老保险。但城市里面没有纳入进去，60 岁以上城市人拿不到，因此北京户籍城乡居民之间矛盾出来了。从 2010 年开始北京就推广到城乡居民一样，60 岁以上每个月地方财政补贴 280 元，干脆全部实施了。看上去是强化了附加在户籍上的福利，但是以后全国肯定要普遍推开，上海肯定也要实施，对现在已经 60 岁以上，不能参加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人群，将来会有一个财政补贴。

这样一来对流动人口有什么好处？使将来农民工多增加了一种养老保险的选择，尤其是那些灵活就业的或者流动性很大不稳定的。他们在流入地不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条件或因无用人单位，个人又缴不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话，还可以自愿选择户籍所在地新农保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也是一种“低门槛准入

低标准享受”养老保险的方式。

第二，农民工市民化当中很长时间难以解决的就是享受流入地户籍居民高考的权利。教育部知道这个事情不公正，但是因为地方利益驱使，必然要求农民工子女一定要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地方教育部门为了强化这个问题，为了保护自己市民的利益，就出不同的考卷。上海市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很多，招生比例相对高。如果高考向农民工子女放开以后，上海市民的子女高考就难了，所以到现在教育部不松口，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很大的问题。使得农民工小孩要么读中专，其他的要高考就回到户籍所在地考，而高校在农民工户籍所在地的招生人数很少。这是第二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市民化很难解决的是保障性住房。上海会不会放？因为是地方财政出钱，所以首先保护上海户籍，包括公共租赁房。现在慢慢放开给人才类居住证的外来人口，但对面广量大的一般农民工肯放吗？

因此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在观念上可以改变，在服务上可以改变，其他的关于农民工条件的改善可以落实，但是这三个瓶颈问题要解决很难。

左学金：第三个问题可以变成企业问题，如果企业要招工，他会想办法安排住房，政府不要插手。

桂世勋：同时低保金享受和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也要跟进，地区间慢慢缩小差距。

左学金：有一个事情没有向市领导汇报。有一位老领导近年来两次找我，希望推动上海放开生育控制政策的试点。但是我人微言轻，没有把这个往上捅。因为原来的上海计生委主任退下来到政协做常委之后曾经跟我说过，之前很多

人跟她提要放开政策，但她一直没有回应，不是她不赞成，是没法做。她说，当时一位市领导去找过当时的国家计生委领导，问上海能不能放？国家计生委领导说这是国策，不能放的。市领导回来以后就关照，说这个问题不讨论。现在中央地方关系比较敏感，现在的市领导愿意冒这个险吗？

乔依德：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报还是要报。

左学金：现在上海做事还有一个麻烦。有时候就算上面愿意动了，下面也不一定积极地去做。

现在好多事情一说到做事好像就是需要地方政府出钱。其实不然。流动人口如果在上海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加入社保，社保不是福利，是保险，大家出钱，大家来享受。严格地说，保险不应该政府大量补贴的。现在政府之所以要补贴，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年轻的外来劳动人口被排除在外面了，所以政府肯定要补贴。但这个道理一般人搞不清楚，他认为外来人口来了以后就是政府要补贴。

当然，低保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的，我完全赞成桂老师说的，低保是福利，你有一个门槛，慢慢转入。这个是两个概念。

为什么现在流动人口有好多问题不能解决？这里有很多误解，认为流动人口一进来财政要掏钱的。实际不是这样。有些问题，比如说他的住房问题，低保问题，这个是财政要掏钱的，我倒不建议这个马上解决。因为很多农民工到上海来，他不需要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些问题，比如出了工伤到医院，医院急诊间不收他，这个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问题。他得了疾病不能得到治疗。哪怕加入了综合保险还是这样。综合保险以上海市平均工资的 60% 为基数，缴纳 5.5%，相当于上海职工平均工资 4 万元的 3.3%，1300 多

元，一年也交了 1300 多元钱。他们不能报销门诊费用，只能报销住院费用，毕竟都是年轻人，住院的概率很低。到了医院还不能看病，需要全部垫付，看病结束了以后，把所有的保险单拿到保险去报。没有起到救急的作用。身上没有钱，他就不能得到治疗？所以有些是政策设计的问题，不是花钱的问题。

我想讲几个问题。计划生育是一个非常态的政策。我们是在特定人口经济社会环境上，19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产生出来的一个特殊政策。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实行这样的政策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有很强烈的理由说这个政策为什么必须继续执行下去，而不是反过来说，你需要很强烈的理由才能放宽这个政策。要有很强烈的理由才能继续，如果没有强烈的理由就不应该继续了。因为这个政策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代价。中国的农村妇女为了计划生育政策，有时被当做牲口一样做手术，计划生育做避孕、节育，事故率是很高的，落下了伤残没有地方告状。所以有学者说计划生育是一把双刃剑，作者这样说还是比较客观和婉转的。为什么叫双刃剑？因为一方面伤害了农村的妇女。温家宝总理免除了农业税以后，我在安徽调研听当地的同志告诉我，农村又有了“新四费”，就是计划生育、殡葬改革、建房、办证，都要收费，叫“新四费”。所以很多政策上面的出发点好的，说殡葬不要搞土葬，但到基层却变成了农民的负担。

有的时候计划生育成为鼓励生育。我在社科院的同事回农村老家探亲，发现计划生育干部主动做农民的工作，让他早点生，说“交点钱就可以了”。我到松江，松江计生委主任告诉我说，有个外来人口在上海怀孕了，他们通知流出地

计生委，但他们不管。等这个孩子生好了以后，飞机飞过来5、6个人，罚56万。为什么56万？说这家外来人口是开店的，一年收入8万，要罚7年。所以都是经济人。有很多东西不便公开讨论。为什么翼城生育率没有那么多高？就因为计划生育并不永远是鼓励你低生育的。

但是反过来说，现在和30年前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相比，环境变化很大。

第一，我们原来要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因为我们要增加投资。这是实行计划生育非常强烈的政策背景。但现在反过来了，我们讲要扩大消费，减少储蓄。

第二，过去我们对人口前景非常担忧，担心人口爆炸。现在坦白说，哪怕没有计划生育，我们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本质上都是东亚的文化，没有理由认为和他们不一样。现在房价很高，男孩子没有房子讨老婆很难。我们到日本发现，日本很多女孩子不结婚，因为找不到如意郎君，男方的收入不能满足女方的要求，很多女孩子不结婚，很多结婚很晚。这也是我们未来发展趋势。我感觉计划生育政策一定要认识到，这是非常态的政策，要有非常强烈的理由才能继续，如果没有强烈的理由不应该继续。

第三，大家比较关心老龄化的问题。上海的老龄化和高龄化趋势比较严重，上海现在60岁以上突破22%了，65岁以上已经16%多，80岁以上也是非常高了。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确实很复杂，我原来做过一个东西，我简单说一下。

老龄化的影响很多方面。对劳动力供求关系，一般人认为人口老龄化了就业问题解决了，因为劳动力少了。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人口老龄化以后，对劳动力需求没有变化，供

给减少，那么就业增加。但是看全世界人口增长慢的国家，发现失业率也很高。原因很简单，因为随着老龄化，需求下来了，同时制造业转移掉了，消费少了。比如日本，失业率原来很低，现在随着老龄化失业率反而增高。欧洲一直是老龄化程度很高的，但是失业率也很高。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关键是劳动力需求不变的假设并不成立。我们常常认为老龄化了，供给减少了，就业率就高了，但是劳动力需求不是不变的，比如制造业外移了。人口老龄化与就业率之间没有一个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

老龄化对于总需求的影响，从经济因素来说，有两种东西是矛盾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中青年人储蓄，老年人要提取储蓄，所以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储蓄率下降。但是合理预期假设认为中青年人看到了老龄化程度很高，会拼命增加储蓄，防止今后公共养老金的破产，所以人口老龄化会提高储蓄率。这两个理论打架，但是最终还是看统计结果。结果发现，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同时，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光是人口的因素。从日本来看，也是储蓄率比较高，最近几年稍微有点降低。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并不能解决消费率上升的问题。

对社会保障的影响，这个是比较明确，没有疑义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影响医疗的不光是老龄化，高龄化是更严重的问题。因为护理成本是非常高的。我在美国的师母得了老年痴呆以后住到养老院，最后一年的费用是 20 万美元。所以我的老师跟我说，如果我师母再活 10 年，家里就破产了，他还是个教授。但是我老师先于我师母去世，他把所有财产留给师母。所以他女儿很生气，碰到我很不高兴，但是我想老师是想让师母有一个好的

终结。

乔依德：你讲的这个特别是随着今后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这个现象会更严重。现在的问题还可以。

左学金：现在的问题是有人说收入提高了，今后老龄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但是护理最大的成本是劳务，现在城里人购买劳务，是中国人有钱还是美国人有钱？我们很少人意识到，现在中国城里人在劳务的购买力上，比美国人有钱。

乔依德：有很多例子，包括华侨在国内买房子，不是其他原因，是因为国内请保姆便宜。他说我什么都好，用保姆，美国几万块哪里能用到，他说家里有几个老外，因为语言不通没有办法用保姆，很羡慕他，否则宁可搬到中国来。

桂世勋：现在上海民间保姆一般的平均价格一个小时 10 元人民币。加拿大平均价格一个小时 8 元加元，等于 50 多块人民币。而且老年人护理的价格高于均价，他们认为照顾老年人很累很脏。我们从国外呆了一段时间回来，我感觉上海城市里的人实际上在享农民工的福，我是体会很深的。

左学金：这个福快要结束了。大年夜吃年夜饭，吃完了以后把嘴巴一擦，这个日子也快要结束了。要知道圣诞夜在美国吃不到年夜饭，所有店都关门了。

我有一位朋友原来在美国工作，年薪 10 多万美元。后来不幸他的妻子生病卧床，需要早晚有人照顾，结果这位教授在美国 10 多万美元收入付了税，付了房贷，只够雇一个保姆。白天由保姆照顾，晚上他自己照顾妻子，弄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因为白天还要上班。结果他回到国内，国内大学给他 40 万人民币。工资减少了很多吧，但是雇两个保姆还绰绰有余。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不要以为收入高了养老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恰恰相

反，养老是社会收入越高，实际购买力越差。老龄化意味着劳务价格的上涨速度更快了。现在所有的养老金都是金融资产，但是很少考虑金融资产今后购买力多少？我敢说，如果人口比例过渡失调（我们人口比例要比美国失调得多），实际上是老人多，提供劳务的人少，很简单的道理，稀缺性导致价格上升。那一点金融资产买不到多少劳务的。

乔依德：还有一条，前一阵子，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以后也没有了。

左学金：对城市化的影响。我个人感觉一个今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会下降，因为农村年轻人少了。蔡昉的调查认为，45岁以下在农村已经很少了，今后可能会更少。但是因为劳动力少了，所以全国城市会逐步调整人口流动的政策，限制会放松。常熟最典型，几年以前本地招工招不到，到外地招，后来外地也招不到成年人，到外地的学校招。先付给学校钱和这个学校定协议，学生毕业以后到这家企业服务几年，这是几年以前就发生的。这是常熟市计生委主任告诉我的。我们上海可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上海吸引力太大，没有这个感觉。但是现在据说有好多劳动介绍所也是需求多供给少，这个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研究。

上海的结构要吸引人，连制度改革也要抓紧。对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结构的影响很大，产业升级是必然的。

创新能力。从理论上说，人口老龄化对创新不利。但是创新是很复杂的问题。看北欧，芬兰、挪威这些国家，创新能力还是不错。我的感觉可能只是一个因素，还不是绝对性因素。从这个例子来看，感觉还不用太担忧。但是有很多制度因素，像教育，芬兰大学的教育这些因素，芬兰教育是世界一流的。

经济变量	影响	说明
就业率	+-	减少对劳动力供给的同时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国内消费需求	-	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需求
社会保障基金财务和公共财政	--	产生重大冲击
人口城乡迁移和城市化	+-	减少农村青年移民的数量，但会减少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政策阻力
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发展	--	削弱劳动密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压力
创新能力	?	理论上认为年青人口的创新能力更强，但是横截面数据的国际比较未能支持上述假设。
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	取决于能否成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

因此总的来说，就业率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的，这个很复杂；国内消费需求下降了；对社保基金是强烈的重大冲击；对人口城市化有两个方面作用；对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是负的；创新能力不确定；对经济增长总体影响不确定。如果产业不升级，上海可能会碰到“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国际分工中，价值链的高端，创新等由西方发达国家或外资企业来做，加工制造等价值链的低端到外地去做了，上海落到陷阱里面去了，这个倒是有一个危险。上海一定要拼命爬升，爬到可以和他们高端竞争了，如果落后了就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麻烦的东西。

乔依德：你这个报告已经做得差不多完成了。

桂世勋：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

应，我刚才讲两点。还有一点，就是由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比重大幅度上升，有利于促进老龄产业发展，形成促进内需的新经济增长点。包括老年服务业、老年保健产品等。老龄产品是最终主要用于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产品。老龄产品有的是老年人自己买，有的是子女、朋友送，这部分肯定会大大提高，只要适销对路。日本前一段时间推出挂在颈部上的保健产品，说有利于防止颈椎疲劳，价格只有 300 多元人民币，子女也大量买了送给老人，但戴了时间长后作用并不很明显。类似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左学金：我们现在上海城保赡养率是 0.65，大概是三分之二，也就是说 1.5 个在职的负担一个退休的。这是比较高的，全国是三个负担一个。但是上海如果把所有各类保险放在一起，农村不算，把城保、综保、镇保放在一起，赡养率是 0.35，也是三个负担一个。所以有好多问题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制度的分割造成的赡养率人为的提高也是一个因素。本来可以做到三个负担一个，现在变成 1.5 个负担一个。所以我建议把城保切成块，本来是 22% 社会统筹加 8% 个人账户，可以考虑从 22% 里拿 12% 出来，变成人人都有，大家共担共享。余下的 10% 另外搞一块，还是原来城保的人来参加。这 12% 的一部分大家都要交。这件事是可以做的，而且对现在上海的城保来说是很大的支持。这个对农民工也好，他们会感到这是基本保险，大家都一样的。

乔依德：还有一个东西上海应该可以提的。上海是 50 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到全国各地去，后来很多老了返回上海，他们的养老现在是上海负担的。全国有一个社保基金，这个基金应该对上海要有所补偿的。

桂世勋：这里面是存在一些不公正，但是要解决很难，会产生连锁反应。现在往往出现的问题就是改革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导致改革成本很高，这个多了，那个少了，造成矛盾相互扯皮，成本很高。

刘焜松：老龄化社会还有一个好处，可能会比较稳定一点，安全会好一些。

左学金：刑事犯罪主要是年轻的男性，但是有的时候创新也是年轻的男性。

刘焜松：还有一个人口规模按照现在的政策到底什么时候调整？

左学金：原来国家计生委一直说到 2050 年 21 世纪中达到 16 亿高峰以后，人口才开始下降。现在把人口目标调到 15 亿，2033 年左右达到高峰了。现在反过来说，我们不能调整生育政策，如果调整，我国人口控制在 15 亿以内的目标就不能实现。上次我去北大开会，我听到这个说法就问，我是计生委专家，国家计生委一直说 16 亿，什么时候变成了 15 亿，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怎么样？没有人说得清楚。

刘焜松：人口红利到顶了吗？大概什么时候结束？

左学金：人口红利是生育率下降了以后，小孩少了，劳动人口占人口总量比较高，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成本比较低，经济发展比较快。看到 2015 年我们国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要多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中国分三个区域的话，我感觉沿海地区人口红利结束了。

桂世勋：像我前面说的，根据我们的预测，上海户籍人口的人口红利机遇期大概在 2018 年左右结束。

左学金：上海现在老年人 22%，社会保障缴费率 62%，发 100 元工资交 62 块保障费，全世界最高了。

桂世勋：2009 年末上海市按照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计算，户籍人口的总抚养比是 31.8%，所以现在还处于人口红利机遇期。

乔依德：什么叫做人口红利定义大家要统一。从抚养比的角度，比如刘易斯拐点以前是怎么样？拐点以后怎么样？刘焜松提的问题，我自己也觉得很重。因为涉及到很多重要方面，涉及到经济方式转型的问题、包括劳动密集型出口型对与不对的问题。尽管我也同意，可能是平滑的曲线，但是大致上要有趋势，因为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养老保险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有你们的观点。

桂世勋：我的预测是中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少于 9 亿要到 2025 年左右。当然也有人预测 2020 年前已经降到了 9 亿以下，但是不会在 2015 以前。

左学金：蔡昉对刘易斯拐点的解释是这样的。假设放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像蓄水池一样储蓄了大量的没有就业的劳动力，城市有需要这些劳动力就释放出来，只要有需求就有供给，而且工资不增加，这就是无限供给。蔡昉认为，不是说劳动力没有供给，但是要增加供给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了，这就意味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拐点到了。

现在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局部地区出现民工荒，一个因为从人口角度看劳动力供给本身增长速度慢，第二个是全国三大工业经济区的再分布，本来大量在沿海，现在分布到中西部，因为中西部投资增加更快，经济增长更快。比如广东很典型，广东的工厂如果不把工资提高，就招不到人了。

乔依德：我觉得另外还需要考虑就业结构的问题。

左学金：就业和社会保障有关。现在 90% 的大学生毕业以后说我要到大型企业，很少说到小型企业，要自己创业

的更少。因为这些地方社会保障太弱了。很多东西造成了大学生，不愿意自己创业的局面。这不是人口学的问题，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广义的制度环境的问题。

乔依德：今天在网上看到，邹至庄（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观点，说中国不要学西方社保制度，中国的养老要以家庭为主，因为学了西方社保制度以后，大家都偷懒了。

顾宝昌：他的前提是家庭养老谁来养，世世代代是养儿防老。但是现在孩子少了，而且走掉了，家庭养老没法养了。

左学金：其实中国的养老模式和国外没有太大区别，国外老人有自理能力的时候也都是居家养老，但是现在的趋势是家庭养老照顾不过来，所以要送到护理院，家里没有人来管。我们今后可能也会经历这种变化，以后有一个老人在家里需要照顾，独生子女除非把工作辞掉，不然谁来养？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顾宝昌：现在讨论城市里的问题，将来可能最先反映在农村。

左学金：你有7个小孩，一个星期7天，每一个人来照顾一天，现在只有一个小孩，难道一个人照顾7天？

